

南京文物精華

器物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器 物 編

民族瑰寶 江南風神

——南京地下出土文物縱覽

南京市文物局局長、研究員 魏正瑾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發展中，南京作為著名古都，有着特殊的貢獻。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一個皇權至上的大一統社會。但在社會轉折的關頭，國家又數度處於分裂之中，戰亂頻繁，生靈塗炭，生產關係遭到衝擊，生產力倍受破壞。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地區，保護、保存和積聚先進生產力，蓄勢待發，這是一個民族、一個歷史傳統得以長期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南京地區正是扮演了這一歷史角色，並由此確立了城市的歷史地位。特別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由初期轉向中期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和經過元末農民戰爭劇烈變革，中國封建社會走向鼎盛的開始——明朝初期，南京是全國經濟、文化十分繁榮的最為穩定的地區。南京在這一過程中流傳下來的歷史文化遺存，是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的物質例證，代表着一個時代，一種輝煌。

(一)

南京地區最古老的考古發現，是1993年在南京東郊湯山出土的直立人顱骨化石。它的生存時代是距今約35萬年的中更新世中期。研究證明，這一直立人化石的性狀特徵，盡管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方面與出土于周口店的直立人北京種的化石十分相似。這一成果又一次證明在中國境內，直立人階段的化石遺存，在體質人類學特徵上具有廣泛的一致性，它對於研究世界範圍內人類的起源、分布與遷徙具有重要意義。就南京而言，從學術的角度看，我們不能把這一發現作為後來南京古代文化發展的起點。但是，從遙遠的亘古時代，南京地區即具有適合人類居住的良好氣候和生態環境而成為直立人生存發展的重要地區，又是很值得驕傲的。

(二)

在距今六千年至四千年左右的原始社會晚期，亦即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南京地區的土著居民，開始了自己的歷史進程。由此一直到公元前三、四世紀，本地區的土著文化按照北陰陽營文化——胥廟類型文化——湖熟文化——吳越文化的基本序列漸次演進。社會組織形態也自原始社會經奴隸社會而進入了初期封建社會。

北陰陽營文化和胥廟類型文化，是寧鎮地區原住民創造的一支寫有濃郁地區特點與風格的原始文化類型。它們以寧鎮丘陵的秦淮河、金川河、滁河等河流的河較平原為主要據點，在該地區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中汲取衣食之源。從已進行過考古發掘的北陰陽營、胥廟、太崗寺、營盤山等文化遺址觀察，當時的人們已經以初期的農業活動為主要的生產手段，有固定的村落和集中埋葬的氏族公共墓地，使用石質生產工具、陶質生活用具和玉石裝飾品。以考古類型學理論分析，這些出土器物的總體面貌與長江下游地區的原始文化有着廣泛的一致性。例如，在器物的群體結構上，石器中盛行穿孔石斧、條形石鏃——有段石鏃、石鋌；陶器以富有特色的鼎、盃、豆、壺為組合；普遍存在的璜、玦、佩、珠構成了玉器的典型系列。而且，這些典型器物在該文化區域內還有着大體一致的器形演變順序。另一方面，北陰陽營文化、胥廟類型文化的器物又具有強烈個性，精緻的橫長形多孔石刀（胥廟的三孔石刀和北陰陽營的七孔石刀是其中的典型），器體扁寬、平面略呈“風”字形的穿孔石斧（也有多孔的），表面打磨得光可鑒人；扁足上端外突凸起的鼎，條形及半璧形帶齒狀花邊的玉璜，連璧形玉環，素面或刻有獸面

紋的梯形玉珮等，它們典型的反映出南京地區原始土著文化的風貌特徵，是遺傳至今不可多得的原始藝術精品。

在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周及春秋戰國時代，南京地區的土著文化繼續發展。這些土著文化雖然不斷受到周邊文化的衝擊和影響，呈現出文化的融合趨勢，但從文化內涵分析，個性特徵仍然十分突出。由此，考古界許多專家將它們命名為“湖熟文化”、“吳越文化”，是有一定根據的。其遺址的典型形態則有湖熟文化的臺形聚落遺址和吳文化的土墩墓遺址。器形特徵明顯的陶鬲、楚、印有幾何形裝飾紋樣的軟陶與硬陶，以及青銅小刀直至青銅鼎、鬲，鮮明地反映出文化發展的新階段。而以六合程橋東周墓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的文物精品，則有力地說明了地方特徵與中原風格的結合是這一時期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

就南京古代城市的產生而言，從春秋戰國至秦漢時代，是古城的醞釀時期。劉毓璜教授曾經指出，“這時的南京，僅僅祇能作為大江南北，從吳頭到楚尾的一個重要渡口。”^①渡口是文化交流與融合最活躍的地區。南京地區文獻中記載着楚威王埋金以鎮王氣、秦始皇鑿秦淮以泄王氣等傳統，一方面是附會于南京政治地理優越形勢的贊嘆，一方面也暗示出這一時期南京地區具有相對獨立特徵的土著文化正在經歷一個融入中原漢文化系統的歷史過程。當時的南京作為長江下游的重要通道，軍事活動和經濟交往十分頻繁。春戰之際，軍事據點性質的“城”相繼出現，著名的有越國范蠡所築“越城”、吳國伍子胥所築“固城”、楚威王所建“金陵邑”。具有行政中心性質的城邑則在秦漢之時形成，為秦的秣陵、江乘、丹陽等縣城，漢代秣陵侯、胡孰侯等封建縣治等。這些歷史記載和考古出土的該時期文物資料，說明了經過一個融合過程，至秦漢時代，南京的早期文化已經成為中原文化體系的一部分，南京作為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形勢正在形成。長期的醞釀為南京作為六朝都城的歷史發展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

公元229年，孫權把南京定為吳國都城，南京城市發展史翻開了新的篇章。從此，在長達17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南京多次作為封建王朝的都城，發揮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作用，為中華民族歷史的存續與發展作出了獨特的卓越的貢獻。在公元3世紀至6世紀的300餘年中，南京連續成為三國吳、東晉及南朝的首都，經濟文化的持續發展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使得南京的古代城市形態得到完善，迅速達到了城市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時期。這一時期在南京留下的豐富遺存、文物精品典型地再現着六朝南京的特點與歷史成就。

繼承着東漢門閥政治的傳統，六朝時代是一個世家大族占據統治地位的時代。士族政治、豪門經濟構成了國家政權的基礎。50餘年的考古發掘，南京地區發現了多處大族的族葬區。它們的形態典型地反映出這一時代特點。大族葬區以東晉時代的象山王氏、東善橋謝氏、老虎山顏氏、仙鶴門高氏等家族墓地和南朝的甘家巷地區、栖霞山地區、西善橋地區等帝(王)陵區為代表，在墓葬區的排列結構及墓葬型制、陳設、裝飾及隨葬品的數量、組合、質量等各方面都表現出鮮明的特色。這些墓葬中普遍出土的磚、石墓誌，是北方文化南遷的重要例證，也反映出大族家族紐帶的牢固與頑固。東晉時代，墓誌以磚質為多，誌文比較簡單，一般只記墓主名諱、籍貫、家族、職官、生卒及葬地等。發展至南朝，石誌漸多，型制漸大，並出現了誌文的長篇宏論，以頌其功德、旌其名節。墓葬空間寬敞，特別如象山七號大墓，運用了產生于北方的先進的磚券砌法，形成一種高穹窿頂的結構。迄于南朝，在諸如西善橋的帝(王)大墓中，更發展出一種墓葬四壁外凸的圓弧形和長橢圓形的墓室結構。實質都是在追求一種寬大、高敞、牢固、特殊的地下埋葬空間。墓內設置棺床、祭臺，圍有帳幔步障，壁飾精美的磚刻拼鑲壁畫，以陶俑為象徵的成群僕役和以鎮墓獸為代表的厭勝祛邪之物，以成組成套瓷器、漆器組成的生活用器組合和更為珍貴的玻璃、鑽石等舶來裝飾物品等等，反映出視死如視生的喪葬觀念，顯示出豪華、奢侈、安逸的貴族氣勢，其中也許包含了人們企圖通過隆重奢華的喪禮以達到家族地位的穩固和統治的長久的目的。

展現着六朝時代文化與科學技術發展的成就，顯示出六朝繼承漢代傳統，開啓隋唐風格的承前啓後的過渡性特徵，這是六朝墓葬及其出土文物的又一個總體特點。魏晉南北朝時代，政治上的分裂，經濟上的衰退，社會的發展經歷着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但與之相反，這一時代的文化與科學技術，却在人們面前呈現出異樣的燦

爛光芒。這一現象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思想根源。李澤厚先生從哲學——美學的角度指出：“它實質上標誌着一種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這是一種新的態度和觀點。”²從神到人的思想轉變，人本思想的發展，人文精神的覺醒，解除了人的思想的精神束縛，人的聰明才智空前活躍。科學技術的發現與發明，文化藝術的繁榮令人目不暇接，南朝總明觀的設置，科學家、文學家集中於建康，極一時之盛。

南京出土的六朝文物，典型地反映了六朝文化與科技發展的成就與趨勢。這一趨勢延續在從漢到唐的整個演變過程之中，而六朝正是這一過程的中點。南京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是極為珍貴的六朝雕刻藝術品。石獸碩大的體型，昂首挺胸、站立行走的姿態，以及細巧的花紋裝飾，給人以極大的藝術震撼力，它們仍存漢代遺風，但氣勢上已失去拙拙與神秘，顯得威武，又透出一種悠閑。從蕭梁諸王墓前的闕邪到陳文帝永寧陵前的麒麟，從意境上已開始邁向了唐代石刻的真實、靈動和細膩。同理，石碑、龜趺與石刻望柱，於粗獷中透出繁縟與秀氣，傳達了同樣的趨勢，表現着一種過渡性的時代特徵。

墓葬方面，東漢以來，磚拱建築技術的發展，使得六朝時代已經能夠建造比較寬敞高大的墓室，這在前文已有敘述。室中裝飾的綫刻磚畫，是六朝藝術的一大特色。漢代的畫像石(磚)畫為磚刻拼鑲畫所代替，題材亦從車馬出行、神人登仙等轉變為獅虎動物長嘯山林和人物日常生活的場景。出土於南朝帝陵的“竹林七賢”及榮啓期磚刻拼鑲畫是其中的代表作。畫面描寫的是東晉時代以酒為伴，放蕩不羈的阮籍、嵇康等七名士。雖然為了講求對稱，加上了春秋時代的榮啓期而變成了“八賢”，但這種對阮、嵇之流所謂名士的描繪與欣賞，一方面從技法上表現了繪畫藝術發展的又一階段，一方面從內容上也反映出當時思想界人文精神的覺醒。這是從漢代神的思想回到現實的哲學轉變的又一例證。畫中八人的放浪自得與樹木、器用的布局顯示出藝術思想和藝術發展并駕齊驅，甚至更為重要、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六朝時代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東晉的王氏、謝氏、顏氏等世家大族墓葬，以及南朝時代貴族大墓出土的墓誌，在我國書法學術界激起一陣陣的研究熱潮。著名的“蘭亭論辨”在書法史上留下的佳話，至今仍在國內外傳誦。南京象山王氏墓誌書法的源流嬗變，及其引起的對“蘭亭序”帖真偽的辯論，書法大家各執己見，結論還有待於新的考古證據與進一步的研究。但這些墓誌書法所表現的六朝時代書法藝術已經擺脫了漢法的方正與規範，逐漸進入了以楷書和行草為主流的新的發展時期，進入了以“綫”的藝術自由地傳達人們思想情趣的新的階段，則是無庸置疑的。

青瓷，是六朝文物中數量最多、琳琅滿目的一類。它是六朝時代新興的工業門類製造出的新的產品。它的迅速普及，逐漸取代漢代漆器與釉陶而成為生活用器的主體，實際上是代表着一種新的生產力對舊生產力的挑戰和勝利。它為社會生活帶來的新的面貌，傳達出一種新的精神。它的型制和裝飾，表現着新的生活概念和藝術理念，為六朝時代科學技術及文化藝術的特徵，作出了新的詮釋。六朝青瓷從用途上可以分為生活用器和喪葬專用器物。後一類器物在屬於六朝早期的吳至西晉時代比較常見。其中有表現大族居住形態的深宅大院建築模型，有表現小農生活的倉庫廚房和家禽家畜園舍模型，有表現僕役形象的傭人等等。有必要着重提出的是魂瓶。魂瓶這種器物，在六朝早期中等以上墓葬中常有發現。過去也有人稱之為“穀倉罐”，或直稱為“堆塑樓閣人物罐”。推測埋入墓中隨葬的用意當與人們對死者靈魂安息的祈念祝願有關。稱為魂瓶能夠表達出人們的這種意念的含義，比較適當。魂瓶從工藝分析，是六朝早期的一種瓷器藝術品，對於研究當時瓷器的雕刻技術、堆型貼塑造型手法，以及瓷器燒造技術，都具有典型的意義。迄至南朝，出現了如蓮花大尊那樣的大型瓷器，則更表現出燒造技術的進步和裝飾水平的提高。墓葬出土六朝青瓷的主要部分還是實用型的生活器皿和用具，包括飲食、盛儲、盥洗、文具等生活各領域的器用。它們反映了當時瓷器的實用性、普及性和製造技術水平。此外，它們還從器形特徵、器物流變等方面向我們傳達了豐富的信息。例如六朝時代造型工藝的藝術審美觀點與情趣；例如典型器物演變序列及其與漢的淵源和隋唐的流變之間的發展關係等。六朝青瓷雖然早中晚期在風格上不盡相同，但總的說來，講求圓潤流暢的曲綫變化，動物的生動造型和簡潔的花紋裝飾，同樣反映出人們在藝術觀念上已摒棄漢代的神秘，轉而崇尚

生活的自然意境。這與六朝承啓轉折的時代特徵相吻合，與人文哲學觀點下的藝術思潮相一致。從六朝器物造型演變序列的分析同樣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過渡性時代特徵的脈絡。六朝器物的造型風格，演變趨勢是由形體小到形體之高大，由扁矮肥寬到渾圓修長，器物的輪廓也從比較刻板的圓弧綫到富于變化的曲綫等。例如常見器物盤口壺與鷄頭執壺。前者經歷的變化趨勢是，口部從徑小盤淺壁直向徑大盤深而外敞發展，頸部從粗短發展到細長，腹部從扁鼓到圓形，進而下腹加長，以至發展到略呈長橢圓體。後者從器形的總體發展上經歷了與盤口壺相似的演變過程，結果是器物形體的愈加修長。“鷄頭”則從實用型器嘴的裝飾，逐漸上移至肩部，變為純為美觀的附飾。執手則從早期的寬扁細圓變成晚期高聳的粗壯執手。至南朝晚期，這些器形的演變已經完成了向隋唐同類器物的形制轉換。限于篇幅，我們在這裏只是就器物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進行了簡略的例舉敘述。實際上，六朝器物的發展，除型制外，諸如釉的應用，花紋裝飾等的變化，也都強烈地反映出這種時代性狀。至于六朝青瓷中的精品力作，在本圖集中都有圖文并茂的介紹，可以彌補本文的簡約。

中外文化交流，特別是佛教傳播留下的印記，構成了六朝的又一個明顯的特徵。這一時期墓葬中出土了玻璃器皿、金剛石指環、鸚鵡螺杯以及薩珊王朝的銀幣等器物，表現出與傳統文化迥異的風格。而以玻璃杯最為典型。在象山王氏大墓、北固山大墓等東晉時代的大型墓葬中，不止一次地出土有玻璃器皿，多數已經破碎，惟象山七號墓出土的兩件玻璃杯，得到了完整的復原。以杯為主要器形的這些玻璃器皿，具有共同的特點。質透明而泛出淺黃色彩，采用磨光工藝于器表飾出花紋，紋飾為多種橢圓形的組合。質量分析認為，它們屬於鈉鈣玻璃系統。以上特徵都與同時期羅馬地區的玻璃製品相同。由此推測，當時在東西方之間存在着比較活躍的交換、贈與和貿易關係。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影響更大、更為重要的是佛教的傳入與傳播。史料記載三國·吳時代，南京建有建初寺，是南京地區第一座佛教寺廟。到了南朝梁代，則出現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的壯觀景象，傳達出六朝是一個佛教開始傳入并迅速達到繁盛狀況的時代。這一信息在出土文物中得到證實。孫吳西晉時代，許多青瓷器，如壺、瓶、罐、鉢等器物上，出現了佛教的貼塑，而以魂瓶最為典型。在魂瓶上，這些小佛像，或與獅子、鋪首等形象組合貼在器物腹部，或在器物上塑立于樓閣門闕、鳥獸人物群塑中，也有環立于器物口沿者。給人的印象是，在當時這些代表外來文化的小佛像還與中國一些傳統的人物、動物、建築等形象處於相似的地位，在人們的心目中尚未作為一種尊崇的形象受到信仰，這應該是當時的佛教還處在傳播初期階段的反映。而將佛教作為人們心目中膜拜的主體對象，大約要到東晉南朝時代才能够形成風氣。南齊永明年間，明僧紹在南京東北之栖霞山舍宅為寺，并開鑿石窟，供奉大佛，開一代崇佛之先。自此以後，經歷代開鑿，栖霞山千佛岩現存計有250餘窟，雖歷遭損毀，仍不失洋洋大觀之氣派，而為研究南方佛教的重要地點。終南朝之世，除梵宇林立而外，人們在墓葬出土器物上也能感受到濃厚的佛教氣息。蓮花紋的裝飾普遍而精美。以青瓷蓮花尊為代表的一些大型瓷器，可能已經成為宗教儀式的專門用器，如果確實如此，則宗教儀式的規模和規範，當已超出我們今天的想像之外。近年來，有學者根據我國南方地區自東漢以來，主要是六朝時代石窟寺造像和出土文物上佛像的不斷發現，提出了“佛教初傳南方之路”的研究課題。雖然這一課題還開始不久，如梁白泉先生所指出的：“佛教初傳南方之路，這個課題的研究，材料還不能算是充分，很多重要的方面和環節仍是模糊不清的。缺少對現有材料的科學分析，但是一些問題已經可以提供思考。”^①從考古學的角度看，這一課題的提出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動向，而值得人們予以足夠的重視。

(四)

六朝的南京是輝煌的。但在公元589年，隋兵攻占建康，消滅了陳王朝。戰爭的蹂躪和殘酷的報復，使得延續了三個世紀的壯麗故都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當中原封建大一統王朝欣欣向榮之時，南京則經歷着一個長期的艱難的休養過程。這個過程是如此之長，以至在幾乎整個封建社會中期階段，南京一直很難再現昔日之輝煌，扮演它曾經擔任過的歷史角色。只有一個短暫的例外，那就是南唐的中興。在唐宋之際的五代十國時期，又一次以



分裂的形式，打亂了封建正統秩序，促使封建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進一步的調整。在這個以破壞為代價的過程中，位於長江流域的南唐、吳越等國也又一次成為存續生產力的較為穩定的基地。作為南唐國都的南京，在經濟文化發展和城市建設上，得到短時期的但具有重要意義的中興時機。這一點突出表現在南京的城市形態的發展上。南唐時代，南京的城市重心南移，在秦淮河北建築了規模頗為壯觀的南唐都城，在六朝建康都城的基礎上，城市得到大規模的擴大和調整，城市格局和功能進一步完善，從而為明朝南京城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是南京城市建設史上的又一個重要階段，可惜這一時期的文物遺存已不很多。不久前在城南內橋附近發現的護龍河石岸以及郊區的南唐二陵、栖霞山舍利塔等是比較典型的南唐遺跡。人們從這裏看到了二陵壁畫如同南唐詞作中所描繪的富麗與纖柔，也看到了肌肉筋凸、威風凜凜的石刻力士與武士雕像、體型碩大的駁岸條石等所表現的勇武與力量。藝術的特徵同樣透露着南唐繼承唐代餘緒走向宋代的歷史內涵。

公元14世紀中葉，明朝王朝崛起，南京的歷史發展到又一個轉折時期。明朝的建立，標誌着中國的封建社會進入了後期發展階段。明太祖朱元璋以封建政治家的氣魄，在封建制度的框架內，進行了一系列社會結構和制度方面的革新，推動着封建社會後期鼎盛狀態的迅速形成。這一時期，南京城市建設史上的突出成就，是這種狀態的十分確切的注解。明南京都城的構築，打破了歷來封建都城型制方正、宮城居中的傳統布局，依崗臨之勢，統河川之利，包容六朝、南唐等歷代舊城又另闢宮城新區，形成了一座規模空前龐大，形式極為奇特的都城。都城之垣，長達33.676公里，集山水城林之勝，人工天成，混然一體。官城的建設，則無論其龐大的規模，或全新的格局，也都別具一制，非前代所可比擬。明太祖之陵墓明孝陵，保持着所選定的良好的風水環境，建造了一條呈“之”字形布局的長神道，又因山為陵，建築了規模宏大的陵宮和寶城。這一系列的變革，開創了一整套關於宮城與帝王陵寢的新規制，並為明清兩朝逾300年各代帝王所遵循。凡此種種，都是一種鬼力與睿智的明證，是封建社會發展到鼎盛時期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之精華。不泥于古制，大膽創新，充分利用生產力發展的高度成就造就出許多鴻篇巨製，這是南京的明代文物具有歷史震撼力的最重要的特點。都城、官城、陵寢而外，還有陽山明代采石場遺跡及陽山碑材的開鑿，“神功聖德”碑及碑亭的建造、大報恩寺琉璃寶塔的創製乃至於神樂觀雕刻精美的井欄石構，都表現着這種特點，而為後人所驚嘆。

南京在明代的顯赫地位，不僅從上述各類建築巨製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同時也可在大族墓葬的考古發現中獲得佐證。開國功勳和貴族的族葬地在南京主要分布于兩個區域。城的東北，紫金山玩珠峰前是明孝陵之所在，山北，從太平門至蔣王廟一線則集中了一批大臣的家族墓，如徐達、常遇春、李文忠、吳良、吳楨、仇成等，另一集中地點在城南之石子崗區域。此地山巒起伏，重岩迭嶂，風景優美。分布着鄧愈、俞通海俞通源兄弟、宋晟等墓區。遠者如葬於今江寧殷巷將軍山之沐英家族，其地亦屬於這一區域的延伸。這些大墓碩大的神道石刻，與孝陵相呼應，以其恢宏的氣勢，為明代南京的歷史地位作出了注解。南京市博物館對上述家族墓地進行了許多考古發掘工作。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更是南京作為明都地位的一種物化表現。這些文物富麗堂皇，是明代衣冠制度的印證。它們的華貴與豪華，又成為當年貴族生活的寫照。冠帶冕服，尚為官階地位的表徵。例如徐達五世孫襲封魏國公徐樞墓中出土了麒麟補服二件，符合《明史·輿服誌》所載的規定制度：“公、侯、駙馬、伯服，綉麒麟、百澤。”補服在緞地衣服的胸背正中綴有補子。補子上以片金織成的麒麟四周飾以雲氣、海水及山崖、牡丹等紋飾，方正規矩，顯示出官員正式服裝的嚴肅和高貴。南京地區曾出土十餘件非常珍貴的官帶。按帶板區分有玉帶、金帶、銀帶、琥珀帶等。其上的紋飾有龍紋、獅蠻紋、葵葉紋等。這些帶飾對於研究明代的輿服制度的形成與定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首飾與大量的“文玩”，則更多地表現着貴族生活的豪華與奢侈。南京明代文物具有的這種歷史價值，構成了它們的顯著特點。南京明代遺存及墓葬出土文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們還突出地反映了明代的科技水平和工藝製造的成就。明代是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高峰時期，幾乎經濟領域的各個門類，由於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工藝水平的指導和運用，都取得了較之前代遠為輝煌的成績。現在保存在紫金山天文臺上的明代天文儀器是其中的代表作，它們繼承着前代的傳統，精巧的構思、精密的鑄造、精美的紋飾，既

是科學研究中天文觀測和記錄的先進儀器，又是代表明代青銅精密鑄造水平的重要實證，還是十分難得的青銅藝術品。科技與藝術在此得到了完美的組合。瓷器燒造、漆木器製作、金屬加工、金銀細工、玉石雕刻及絲綢紡織工業如雲錦織造等領域，也都是新工藝、新技術成果迭出。例如瓷器製造中色釉的創造，明代又燒造成功珐華釉、霽藍釉及五彩瓷器，五光十色，美不勝收。再如金銀細工採用了錘碟、盤絲、繫絲、鑿刻、鑲嵌、焊接等多種技巧，編織出許多巧奪天工的首飾精品，等等。這些作品的新穎、精緻成為當時科技與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物質例證。

明都南京的文物，還以其顯著的精品屬性，表達着明代社會在文化藝術上的審美觀念及其發展趨勢。它反映了文物價值的又一特點。在這一方面，明代社會中，似乎存在着兩種潮流，它們在互相影響和激蕩中發展。一方面是文化的傳統，一方面是世俗化的趨向。明代文化藝術的世俗化趨向是明顯的。貴族的奢侈與市民階層需求的旺盛，在這樣的刺激下，藝術的商品化特徵隨着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日益顯著，這一特徵有利于文化藝術的普及與繁榮，也會使作品粗糙和輕浮。而另一方面，文化的傳統仍始終按其規律發展着。在文學藝術的諸多領域，講究作品的典雅和精緻，追求意境的雋永和悠遠。在書法繪畫方面，繼承着宋代的傳統，以意蘊深長為追求目標，創作出許多風格清新的作品。南京市博物館收藏的徐渭、林良、顧璘等人的作品反映着這種風格的追求。在瓷器製造方面，以青花梅瓶、玉壺春等為代表的一批器物，器型精緻典雅，花紋素潔、圖案精美。明初開國功臣寧王沐英墓出土的飾有“蕭何追韓信”主題圖案的青花梅瓶，造型、色彩、構圖均為一流，代表着一種至高的境界。東勝侯汪興祖墓中出土的仿宋官窑、哥窑瓷盤，表現出強烈的復古觀念和追求素雅的意趣。明代傢俱中對於線條美感和向往，和上述書畫作品如出一轍。同樣的，一批工藝精品，則運用嫺熟的技藝更直接地表達着這種追求。用大塊琥珀製作的琥珀杯，造型的主體却是一位老漁翁，粗細中透出悠閒。用優質玉材立雕出驚鵲戲荷的白雲雕刻品，栩栩的形象讓人賞心悅目。汪興祖墓的玉帶板，和閩白玉的溫潤和美麗襯托出透雕雲龍的生動活躍，等等。凡此種種，明代的文化藝術潮流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以上，我們順序檢閱了南京古代的歷史文化遺產。限於篇幅，本文只是作了一個梗概性的敘述。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傳達着歷史的、科學的、藝術的信息。在表現自身永恒價值的同時，生動地描繪着古代南京的輝煌，從而確立了南京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古都南京的成就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南京作為著名古都，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歷史地位。故都歷史的千年輝煌匯成的文化之河、藝術之流，滋潤着民族的發展，培育着新的英才，新的風神。

二〇〇〇年五月於金陵成賢街

注釋：

①劉曉瑛：《南京古城的歷史地位及其保護工作的幾點建議》，載《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會議資料匯編》，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

②李澤厚：《美的歷程》第五章“魏晉風度”，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90頁。

③賀雲翱、阮榮春等：《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文物出版社，1994年。詳見該書所錄之梁白泉先生序文。

玉石器

Stone and Jade



出于自然 富寓人文

——南京出土玉石器一瞥

□ 賀雲翱

石頭是地球上最常見的自然物之一，也是與人類關係至為密切的一種生產原料。當世界上第一批用石頭製作的勞動工具產生的時候，人類的歷史就揭開了第一頁。用石頭製作工具并創造文化，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的“石器時代”，這個時代奠定了此後一切文明的基礎。南京地下出土的文物，證明人們最早使用的工具是石器，本書收錄的五、六千年前的石刀，雖然質地普通，製作技術原始，但那優美流暢、符合力學原理的造型和扁薄的器身及圓潤的孔洞，反映出先民們當時已經摸索出將便攜實用與美觀簡潔相結合的工具製造原理。

隨着文明的發展，青銅器和鐵器先後登上歷史舞臺，石質工具逐步退出生產領域，但人們對石頭的利用并未放棄，以石頭加工成禮器、宗教藝術品、建築構件乃至鐫刻印信鑒章，為中國文明不斷增加新的內涵。總之，在文明發展過程中，石頭始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們從書中所錄禮器石璧、明器石馬、石俑、石窮奇和宗教作像石佛、菩薩、供養人和老君像上，不難看到先人通過石頭所寄托的聖潔的感情和賦予的美的認知：那石璧本身是“天圓”的象徵，而其表面又以管鑽刻出一個個圓圈，以圓的重疊和交織表述了製作者和使用者對古代天宇的無限尊崇；石雕明器的使用蘊含着人們對逝者的懷念和祝願，希望已經終結的生命真的能在另一個世界中馳騁或優遊，并且不受邪惡的侵擾；佛、菩薩、供養人、老君都是以生人為原形雕製出來的冰涼的石像，但在先人眼裏，它們却具有可以拯救苦難扭轉命運的非凡能力，所以從雕刻技法上看，人們在它們身上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從而使之成為某一時代的經典作品。

玉，原來也不過是一種石頭，只是質地更加堅硬，并具有透光溫潤而美麗的感覺，然而在中國，它更是一種文化。東漢人許慎在他的名著《說文解字》中就提出“玉，石之美有五德者。”的觀點，五德者，乃“溫潤以澤，仁之方也”（溫和可愛，仁者愛人）；“鰓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表裏一致，誠實忠厚）；“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達觀懷遠，讓人舒暢）；“不撓而折，勇之方也”（堅持正義，寧折不彎）；“銳廉而不忤，絜之方也”（有棱有角，但不傷人，寬容大度，志節高尚）。以玉之特質，喻人及人類社會之美德，可謂“天人合一”之例證。世界上愛玉的民族不僅是中華民族，但只有中國先人才把玉發展成一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玉文化”是一種優秀的民族文​​化，它塑造了以玉比德的“君子人格”和“類玉”的審美觀，人們通過玉，把自身融入玉所造就的物質、觀念一體的特殊心境之中，在玉的品質和美感中觀照自身，達到身心的和諧和對生命價值的肯定。

早在6000多年前，南京地區的先民已經發現了“玉”的美麗和堅致，書中收錄的南京市區北陰陽營遺址出土的瑪瑙質雨花石子及由玉璜、玉琮、玉管組成的頭飾，高淳薛城遺址和朝墩頭遺址發現的玉璜、玉琮、玉鐙、玉人，江寧谷廟遺址出土的玉璜、冠形玉飾及浦口營盤山遺址出土的龍形玉飾等，或具良好的天然質地，或予細緻的琢磨工藝，在尚無任何金屬器具存在而且物質生活十分貧乏的遠古時代，人們硬是憑着“他山之石”慢慢解

開硬度在摩氏六度以上的玉材，有的還要鑲孔或刻出細部花紋，若沒有深層的精神動力，要將這種製作毫無實用價值的物品的艱辛勞動堅持下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新石器時代的玉器盡管看上去大多是飾品，但實際上它們應屬於具有某種宗教含義的“神器”，“玉能通靈”“事神”的觀念在歷史長河中至少被先人們信奉了數千年。西周以降，從《詩經》到《論語》，從周公、孔子到管仲，先秦的政治家、思想家、詩人和匠師，把玉發展成了一種文化，玉成為國家大典的重器、仁義道德的化身和君子人格的象徵。南京出土的成文史以後的玉器，既有代表社會身份的春秋時代和六朝時代的玉質劍具，也有漢晉時期的禮儀重器玉璧、南唐時代皇帝使用的玉哀冊、明代開國元勳擁有的雕龍玉帶，既有反映道家宗教思想的玉蟾和喪葬觀念的玉蟬，也有標識財富和地位的玉製佩飾、帶鉤，還有明代高官豪族所用陳設器玉碗、貫耳瓶等，反映出從先秦到宋明時代，玉器逐漸擺脫神秘體制而更多地與人倫及日常生活相結合的發展軌跡。但是，由於玉器的珍貴，它們一般與平民百姓無緣，因而多出於大中型貴族墓葬之中。

如果我們由具體的玉石類文物進而放眼於南京的歷史文化積澱，我們還會驚奇地發現，玉石與南京真的有着不解之緣。南京鍾山石質偏紫紅，于是最早到南京的國家最高統治者秦始皇便認定金陵有“王氣”，遂在此實施了埋金“厭氣”之術；開啓南京建都史第一頁的吳大帝孫權，剛到南京時選定的城邑所在是“石頭山”，此後石頭城就成了南京的一個代稱；到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代時，文學巨匠曹雪芹在《紅樓夢》（一名《石頭記》）中刻畫了發生於石頭城老街上兩位以玉為象徵的歷史人物“寶玉”和“黛玉”的人生悲劇。即使是普普通通的瑪瑙、寶兩花石子，幾乎從史前一直流行到當代，還留下“雨花臺”這樣的富有傳奇色彩的風景名勝。通過玉石類的文物和由玉石文化發育起來的思想觀念及文學藝術作品，我們能夠更多地感受到南京這方水土的天生麗質，領略到南京先民的聰明睿智，體悟到南京這座古都的深沉可愛。

雨花石子

Agate pebbles (Rain Flower Terrace Pebbles)

新石器時代

the Neolithic 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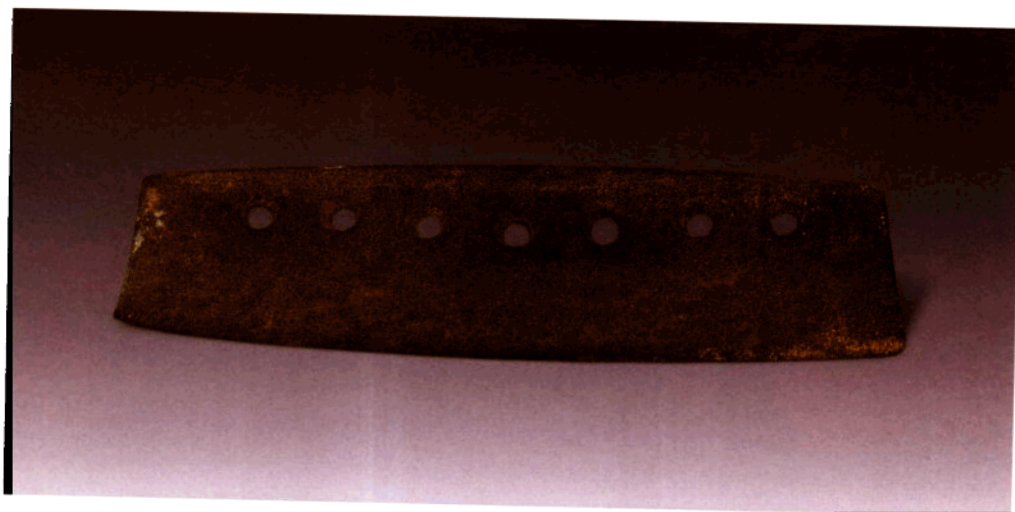


自然礫石。產于南京南郊雨花臺和六合等地，俗稱“雨花石”。質地多為玉髓。花紋和色彩美麗。這批雨花石子出土于南京市區北陰陽營新石器時代遺址，有的置于死者口中，開古代葬俗中口含之先河。我國先民有“美石為玉”的觀念，可見5000多年前南京地區原始居民已對玉石之美有所發現、崇拜和喜愛。（賀雲翱）

七孔石刀 新石器時代

Stone knife with seven perforations

the Neolithic 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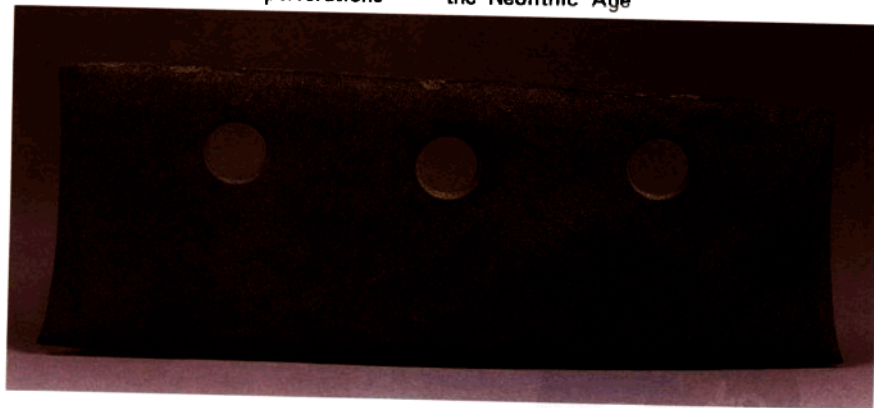


原始農具。長22.6、寬6.25、厚1.2釐米。花崗岩石製作，器形規正，呈扁平長方形，通體磨製，光潤呈藍灰色，背部鑽有七個圓孔，以便扎于木柄上，七孔渾圓，作一字形等距離排列，顯示了純熟的鑽孔技術。1956年南京北陰陽營文化遺址出土，現藏南京博物院。（徐嶸）

三孔石刀 新石器時代

Stone knife with three perforations

the Neolithic Age



原始石製農具。長23.4、寬8.8釐米。長方形，通體磨光。近刃部稍外撇，雙面刃，中部等距離排列三個圓孔，孔有對鑽的痕跡。江寧荅廟遺址出土，現藏南京市博物館。（葛玲玲）

石璧

Stone bi-disc

漢

Han Dynasty



古代禮器。外徑12.4、內徑4.6、厚0.5釐米。以黑色石材製成，器表打磨光潔，局部有蝕斑、蝕孔。兩面飾三周雙圈紋，內外緣各有一周凹弦紋。南京郊區出土。（崔寶）

石馬

南朝

Stone horse

Southern Dynasties



石雕明器。長40、寬14、高36釐米。昂首，圓睜雙目，細腰，圓臀，尾長而粗，直連底座。底座呈長方形。馬四腿略呈方柱狀，有轡、鞍，鞍下有鐙，形神兼備。南京燕子磯梁普通二年(521年)墓出土。現藏于南京市博物館。(王泉)

石女俑

Stone of woman figurine

南朝

Southern Dynasties



石雕明器。高53釐米。石灰岩質地，呈灰白色。頭挽雙髻，衣長至膝，右手握于胸前，下着曳地長裙。此俑眉目清晰，衣紋流暢，是研究六朝時期服飾、髮飾演變及雕塑史的重要資料。南京靈山出土，現藏于南京市博物館。（王泉）

石窮奇

Stone Qiongqi a monster

南朝

Southern Dynasties



石雕鎮墓獸。高22.8、長38.6釐米。石灰石質，體態似牛，從頭至尾有一道鋸齒狀脊毛。
窮奇是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猛獸，置于墓中以求鎮邪。體量如此龐大的石窮奇，是南朝墓中僅見的。1972年南京靈山出土，現藏南京市博物館。（莊敏）